

历史的想象力: 处于因果陷阱中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

胡翼青 戎青

摘要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与其媒介社会史巨著《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在因果关系的各个方面都难以自圆其说。她宣称印刷机是变革动因,但实际上却论证了它是变革诱因;她在多变量解释与单变量解释的两难境地中不能自拔;她甚至使用了因果倒置的假设与推理。然而这些都无损《印刷机》一书的理论价值。整体性思维以及对研究问题的重新陈述使该书充满了学术的想象力。

关键词

因果关系、想象力、印刷机、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作者简介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电邮: newsfox@nju.edu.cn。

戎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电邮: qingqingrong319@163.com。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is in a Causality Trap

HU Yiqing RONG Qing

Abstract

Elizabeth Eisensten and her social media historical masterpiece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 are difficult to justify her own arguments at all aspects. She claimed that the printing press is an agent of change but it is proved to be innovation incentives in her analyze. She was frozen in the dilemma of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interpretation, beyond that, she even used the causality-inversed assumptions and reasoning. However, these drawbacks didn't harm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e book “Printing Press”. The comprehensive thinking and restatement of



the study made the book full of scientific imagination.

Keywords

causality, imagination, printing press, Elizabeth Eisensten

Author

Hu Yiq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Email: newsfox@nju.edu.cn.

Rong Qing is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Email: qingqingrong319@163.com.

任何做传播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二元框架：历史取向之于理论取向的对立。从表面上看，这两者不存在着什么矛盾，很多人看到的只是两者的统一性：没有理论的思想史只是一堆材料的堆砌，而没有史实的思想史则只是一些空想。然而，一旦进入实际操作层面或者说到了方法论的范畴，这两者一定存在矛盾，史实常常无法满足理论推演的需要，这不仅是因为文本不能替代那些没有被记录在案的观念和行动，而且也是因为史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理论所需要的那种因果规律。于是，强调理论优先的写作者常常会被认为是没有根据的推演，而强调史实优先的写作者则通常会被认为缺乏想象力。能够很好兼顾两者的作品几乎是凤毛麟角。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与其媒介社会史巨著《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以下简称《印刷机》）一直被看作媒介发展史的经典之作。自本书问世至今，作者的想象力一直为人称道，而作者的材料功底也颇得好评。然而，这部作品更是一部典范的个案，它向我们展示了在社会史研究中，强调想象力的理论与强调材料功夫的史实之间的取舍是多么两难的选择。

动因抑或诱因？

想读懂《印刷机》一书，必须先从作者在前言后半段对方法论的叙述开始：“最后该对书名做一点说明，其中的‘an agent’表明印刷机是西欧变革的动因之一，我没有说印刷机是特定的变革动因（the agent），更没有说印刷机是唯一的变革动因（the only agent）。读者对我初期几篇文章的反应使我有必要对书名中的‘动因’作上述辨析。”（爱森斯



坦,1979/2010:6) 如果不仔细分析“动因”这个关键词,可能根本读不出爱森斯坦这番陈述的内在矛盾。然而正是这个词,深刻地暴露了爱森斯坦自相矛盾的因果观。

从爱森斯坦的宣称来看,印刷机是一种历史动因而不是环境诱因。即使她辩驳说印刷机只是动因之一,但我们仍然不难看出她想强调印刷机是一种独立的推动力。动因的效果是较为微观、突变、直接和确定的,是可以观察到的,可以作为实证主义史学的依据。但想说清楚什么是动因是很困难的,除非有充分的数据和史实来说明这一点。然而,恰恰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可以来说明印刷机直接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或改变了历史。正如爱森斯坦所讲的那样:“描绘谷登堡的发明这一抽象概念的‘力量和效应’必然会遭遇许多困难。一方面,它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另一方面它又似乎改变了一切。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同意,15世纪的前半叶和后半叶不能够划一条界限分明的分割线。”(爱森斯坦,1979/2010:19)

现有的史料表明,在可以观察的微观层面印刷书并没有产生任何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在1个世纪中它都没有能在与手抄书的竞争中获得优势。更多的史学家支持印刷书的优势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渐渐确立起来的,在其早期,它并没有取得什么优势:“在印刷术发明后的第一百年里产生的书籍文化和过去的手抄书文化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你越细察这个时期的初期机印本,印刷术带来的变化就越是不可能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爱森斯坦,1979/2010:15) 印刷机所带来的变化不太容易被当时的社会所明确地感知,而且在整个欧洲一致性和同步性的变化肯定是不存在的。鉴于识字率低、多数社会成员较为贫困等一系列当时的社会状况,印刷机所造成的社会变革在现象上确实不易觉察,这种影响可能只局限于很小一部分社会成员之间。“在印刷术发展的欧洲诸国里,早年的总人口绝对不到1亿,其中识字者仅占少数。”(费夫贺,马尔坦,1976/2006:249) 即使是在一小部分社会成员那里,印刷术的作用也未必见得是在推动社会进步或社会革新:“印刷在某些领域,确实帮了学者的忙,但若据此认定,加速促成时人接受新知、新观念的,就是印刷术,整体而言仍然不宜。事实上,印刷术还一度推广着既定的旧信仰,强化了传统的偏见,并令似是而非的理论更难动摇;许多新观点难获认同,甚至可说是印刷术从中作梗。”(费夫贺,马尔坦,1976/2006:282)



在《印刷机》一书中,爱森斯坦指出了她在前人研究中发现了这样一种普遍现象:“人们非常关注这一发明为技术发展铺平道路的贡献。许多人努力界定谷登堡究竟‘发明’了什么,试图描绘活字印刷如何滥觞,并且记述新兴印刷机如何普及。至于印刷术在欧洲普及以后产生的结果,却很少有人问津。阐述这些结果的明快的理论尚无人提出,验证或辩难的理论就更说不上。”(爱森斯坦,1979/2010:3)另外,谁都知道印刷术很重要,比如培根认为印刷术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外貌与状况,而且这一判断得到了他之后几乎所有人的认同,但最终大家还是得接受这样无奈的结局:

“直到今天,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对西方文明影响的还有待解释。”(爱森斯坦,1979/2010:4)对此,爱森斯坦感到非常疑惑又非常无奈,她很想改变这种状况。然而,这种现象几乎是采用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的必然结果:若一切都必须找到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最容易找到的史料自然是可以被描述的社会现象,比如印刷机如何普及。但印刷机普及之后产生的隐性结果,则很难以一种因果关系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在《印刷机》一书中,爱森斯坦也没有找到什么新证据,她承认印刷机从现象层面并没有立即造成当时社会的快速变革。与她的同行们一样,在整本书中,爱森斯坦也无法通过确凿的史料向我们展示印刷机直接导致的突变性的历史后果或者说印刷机导致的突变性的历史后果。也就是说她始终没有证明印刷机作为一种动因推动了社会 and 人类社会的变革。

其实,爱森斯坦在行文中所做的大部分努力,就是在描绘作为一种环境诱因或催化剂,印刷机所掀起的传播革命如何改变了各种社会元素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形成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合力。这一点非常类似于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所开创的媒介环境学视角。从她对麦克卢汉关于印刷术未经证实、天马行空的思想的推崇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她赞赏麦克卢汉在历史学家看来不值一提的《谷腾堡星系》,认为“麦克卢汉提到的一些变化很可能有助于对长期存在的问题做出更加令人满意的回答,至少能够帮助我们跳出循环论证和议而不决的窠臼”。(爱森斯坦,1979/2010:前言2)正是这种想法,使爱森斯坦超越了她的历史学同行。她所说的印刷术带来的突变,比如印刷术与科学革命、宗教革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基于具体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总体归纳,揭示的是一种从宏观层面概括出来的规律,所以,爱森斯坦实际上在论证印刷机作为一种环境诱因如何推进了人类的社



会变革和文化变迁。不客气地说，她实际上偏离了她原先的预想。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像雷蒙·阿隆那样去区分两种不同的因果关系。雷蒙·阿隆认为：“规律的概念和因果的概念本来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后者用来指力量，指产生效果的创造能力。前者则指规律性，而其本身又受另外一种更高级力量的支配。……在这种意义上，就意味着规律在普遍与微观这两个方面初步逾越于因果性之外。”（张文杰等,1984：59）在自然科学中，两者关联紧密，在所有的因果关系中就包含着规律。而在历史中，两者之间想要建立一致性是非常困难的。“具体说来，历史规律……就具有这类超科学特性的成分。”（张文杰等,1984：59）爱森斯坦从环境诱因角度所做的论证更有助于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无法说明印刷术所产生的直接力量与效果。

那么爱森斯坦为什么不干脆写一本《作为变革诱因的印刷机》呢？那可能是因为对诱因的分析有违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观念，因为诱因是不确定的，是一种概率性和或然性的推动力，甚至可能只是一种增加速度的媒质，因此它实际上解构了实证主义史学的因果观，这在根本上有违爱森斯坦所受的专业训练和她那个学科的共同旨趣。所以她又强调说：“麦克卢汉神谕式的宣示并不足以构成一个论证充分的出发点。首先要回答印刷术产生的实际后果，我们才能够着手对其他问题进行探索。”（爱森斯坦,1979/2010：前言2）从这种阐述中不难发现，实证视角与直觉视角的对立让爱森斯坦完全处于自相矛盾的焦虑之中，从而陷入了因果关系的陷阱。

现在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这部书整整写了15年时间（1963—1979），长达到80余万字，各种证据写得细腻至极，作者本人仍然不是十分满意，原因是她本人始终在动因和诱因的两难中挣扎。如果她采取媒介环境学的态度，越过历史学的因果考据，那么这部作品的科学性就会受到极大的怀疑，而且她将不可避免地背叛本学科研究方法；然而如果她采用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她始终无法超越她的前辈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考据，而且也没有办法突破他们所限定的渐进式历史观的框架。

技术决定论的陷阱

然而，爱森斯坦在因果关系上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一旦从传



播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入手来解释印刷机的作用,麦克卢汉理论的突出优点与突出缺点便同时暴露无余。而这个突出的缺点带来的问题便是如何洗刷技术决定论的污名。

尽管给爱森斯坦简单地贴上技术决定论的标签是不负责任的,但爱森斯坦努力在做的两件事——证明人类走向现代性最重要的变革均在印刷术普及过程之中与之后以及印刷术是一种独立的推动力——使她无法摆脱技术决定论的阴影。

在第一个问题上,爱森斯坦整本书都试图证明这样一些重大命题:

文艺复兴真正重要的发展阶段——文艺复兴的第二个阶段——是发生在印刷术广泛传播之后:“倘若印刷术到16世纪以后才出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可能像是12世纪所谓的‘原型人文主义’运动。如果是那样,文艺复兴运动就不是逐渐失去活力,而是迅速死亡——在兴旺之前就夭折了。”(爱森斯坦,1979/2010: 185)在爱森斯坦看来,印刷术使得15世纪的文艺复兴与9世纪加洛林复兴和12世纪意大利复兴区别开来,虽然这些复兴都是将希腊古籍翻译成拉丁文,但是后者由于局限于手抄书,影响短暂而局限而且还有倒退的发现。然而,15世纪的文艺复兴是全面、持久的复兴。

新教的反叛发生在印刷术广泛传播之后:“总之,似乎可以保险地断言,如果我们尊重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将印刷术的出现置于前面而新教的反叛置于后,那么,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和混乱相关的一切问题就不会那么令人困惑了。”(爱森斯坦,1979/2010: 280)

教会与科学的分离也发生在印刷术出现以后:“印刷术出现之前,‘天体如何运行’的科学探询和‘如何上天堂’的宗教关怀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游移不定的复活节提出了历法的问题,所以教会在纪念福音真理时就需要天文学家的帮助。然而,印刷术出现以后,天体力学的研究就被推进到新的方向,而且达到很精妙的程度,把历法问题和古老的算法远远地抛在后面了。”(爱森斯坦,1979/2010: 433)

如此的论证实在太多,我们不再一一罗列。历史照理是不容假设的,而为了建立印刷术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先后关系,爱森斯坦通过假言性的断言去说明自己的想法。然而即使建立了先后关系也并不等于因果关系,于是爱森斯坦还必须证明印刷术是这一系列后果的原因。不仅如此,她还得



证明印刷术是个影响力上的单变量，也就是说她得证明印刷术并不是与其他的的一个重要因素共同起作用。

对于实证主义历史学来说，多变量解释等于没有解释。比如我们通常认为某些历史性的变革是由各种社会因素的合力推动的，可是这种真理式的结论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结论，大家一定会继续追问，比如哪一种力量扮演了更为主要的角色。所以多变量解释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研究的意义。如果我们说，现代性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共同发展的合力构成的，其中也包括印刷术的积极作用，那么这样的判断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所以爱森斯坦必然会反对这样来解释印刷术对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如前所述，爱森斯坦根本就找不到证据证明印刷术是推动欧洲走向现代性的单一因素。而且如果她硬要这么说，她马上就会被认为是媒介决定论者或技术决定论者。技术决定论通常是一种声名狼藉的指责，它往往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技术对文化和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技术决定论认为，科学发现有一个自主的线性展开进程，这一机制适用于技术发明，使技术发明快速展开、顺利传播并最终产生社会变革。这不是简单的社会—技术变革模式，而是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麦圭根，2004/2010:25-26）所以历史研究者一直在力图避免自己的作品给人造成技术决定论的印象。然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如果用多变量来解释历史，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可能就会面临虚无主义的境地；而如果过分强调单变量解释，则立即会被贴上历史决定论的标签，研究者的历史观就会被认为是机械的和目的论的。

为了回避这种指责，爱森斯坦声明：“我的目的是丰富对历史的理解，而不是使之贫乏；我认为单一变数的解释与这样的宗旨格格不入。对技术革新的断言被吹嘘得过头时，历史的视角就难以维持了。这个道理千真万确。”（爱森斯坦，1979/2010:6）她进而补充说：“我的立场是为迄今被忽略的历史变革的一个方面留下用武之地。我反对惯常的多变量解释（已经数次表态），但这不是用单一变量解释来替代多变量解释，而是要说明为何长期存在的许多变量以新的方式进行互动（笔者认为，根据上下文，这里应当统一译为相互作用）。许多种相互作用包括旧讯息和新媒

介、文化文本和技术革新、手工与脑力、工匠和学者、布道者和印刷商的相互作用。”爱森斯坦通过修正和调和来规避这一两难境地的方法，只能说自己是一个修正主义的一元论者并试图用互动理论来说明印刷机的作用是在不同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呈现的。但这种阐述其实比多变量解释还要不确定，其推测的成分更多，其结论更不可靠。而另一方面，她还是会被看作是技术决定论者，因为她突出强调了印刷术带来的变革。对技术作用的过度渲染和忽视不宣，都是对历史真相的扭曲。用放大镜照过《印刷机》中的印刷术后，我们仍然需要缩小镜将其还原为正确的大小，可惜爱森斯坦没有为读者们提供这个工具，而需要读者自备。

另一个不能回避的挑战便是孰因孰果的问题。如果强调印刷术作为历史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就意味着人文主义与大学教育、现代性、科学的兴起等是它推动的结果。然而，恰恰这种说法可以有一种完全相反的理解，那就是人文主义、大学教育、现代性的世俗化生活等的兴起，推动了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一种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是对于书的强烈需求造就了印刷书的兴起：“为什么第一本印刷书出现在这个节骨眼上，约当15世纪的中叶？……15世纪之初，许许多多的变化正在孕育，令人不得不更积极地思考，该如何改良手抄本的供给，满足愈来愈庞大的需求。从大学创立的13世纪起，新的需求便发展起来，希望能拥有更多的手抄本。然而，纵有学术、教育风气再度鼎盛，手抄本产业却只有小幅进步……毕竟还是得靠人亲手写成。”（费夫贺，马尔坦，1976/2006:1）尽管这些说法也值得推敲，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某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地理类书籍的兴盛推动了地理大发现，还不如说地理大发现哺育了地理类书籍的市场；与其说是印刷术的出现推动了近代大学的发展，不如说近代大学的发展对印刷术的普及意义重大；与其说宗教书籍的传播推动了宗教改革还不如说宗教改革使人们对各种宗教书籍有了更多的需求。甚至，从黑死病的角度解释宗教改革为什么会发生都比印刷术更有说服力。教皇在黑死病泛滥之时的束手无策和道行逆施，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欧洲人对罗马教廷的信任。这种信任危机与其他不满相映照，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教皇的权威。费夫贺等学者甚至提醒要注意片面夸大印刷术在宗教改革的作用会导致荒谬：“将宗教改革的肇始与发展，过度归功于印刷书或传道人，则失之偏颇；对此我们当然得戒慎小心。把新教的宣传与新教推广者，视为这种变革历程的主

要起因,同样有误。本书的宗旨,也不是为了让‘印刷这宗教改革之母’的荒谬命题借尸还魂。”(费夫贺,马尔坦,1976/2006:296)所以一旦当爱森斯坦要去强调印刷术的积极作用,她马上就会面临上述一系列论证的挑战,而且从最严谨的因果关系判断来看,爱森斯坦所列举的大部分证据当然是成立的,但也有相当多的证据有因果倒置的嫌疑。

由此可见,在处理因果关系的各个方面,爱森斯坦实难自圆其说,可以说深陷因果关系的陷阱之中。

社会观念史的想象力

那是不是说《印刷机》其实只不过是一部徒有虚名之作呢?笔者认为这取决于从什么角度看这个问题。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麦克卢汉的《谷腾堡星系》一书简直完全不能成立。但如果从激发探索和想象力的角度来说,这本书简直就像望远镜一样,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视野。

麦克卢汉的这本书是从解读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开始的。他从李尔王准备瓜分其王国给三个女儿的对话中推知莎士比亚已经洞察到了由印刷术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和专业分工,世界已经从包容世界走向排他世界。他完全不屑于论证《李尔王》里所展现出的人格为什么就是现代个人主义人格,更不屑于论证它与印刷术有什么因果关系。准确地说,他根本打算无视因果关系。可能是觉得文学作品不足以作为证据,于是他引用人类学家对非洲口语部落文化的研究来说明由于印刷术的出现强化了西方人的视觉文化:“听觉世界炙热,视觉世界却是淡漠而中立。对来自听觉世界的人而言,西方人确实冷若冰霜。”(麦克鲁汉,1962/2008:42)以此为起点,麦克卢汉开始旁若无人,毫无证据地强调,印刷术延伸了人的视觉感官,并造成了感官比例的失衡,我们从整体性人格走向了分裂性人格:“书籍必然让社会陷入二元对立,让个人内在分裂。”(麦克鲁汉,1962/2008:115)而这种人格的变化又影响到群体内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导致了民族认同、民族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这一系大胆的推测,完全建立在麦克卢汉奇特的媒介史观之上,他认为是印刷术使人类从一种伊甸园式的部落生活步入了现代性的生活,他断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因为电子媒体而重回伊甸园。为了维护这个先验的论断,他用人





类的文学史和人类学研究为其做注脚。从史学的角度来看,麦克卢汉完全不值一提,因为他既无科学精神也无实证材料,完全不符合史学的方法。然而,你却不能否认麦克卢汉的方式极大地开拓着我们的思维,他的每一点论断,比如印刷术与标准化,印刷术与个人主义、印刷术与理性,都能让我们反思技术如何建构我们的生存环境。

与麦克卢汉一样,或者由于受到麦克卢汉的影响,《印刷机》一书的真正价值就是爱森斯坦的大胆推测所引发的理论思考。该书在繁复历史叙事之下掩藏着的作者惊人的想象力。而且与麦克卢汉不同的是,如果说麦克卢汉只是醉心于印刷术与人的感官比例以及人格的关系,那么爱森斯坦所更多展现的则是印刷术如何改变人类的社会观念,印刷术怎样把人类带入现代性的生活。不过,他们都超越了对于表象的关注,而努力去把握可观察社会现实背后的东西,比如关系和观念的变革。

在《印刷机》一书之前,年鉴学派的代表著作《印刷书的诞生》可以被看作是史学界关于印刷术历史的代表作品,该书从造纸术开始谈起,写到了各种印刷技术及其诞生发展的历史,分析了书的样貌和市场运作,围绕图书生意而建立起来的行业分工与社会交往。然而这一系列言之有据的历史记载,仅仅提供了我们关于当时印刷业的一幅画卷,却无法激发我们去思考这种媒介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为人类社会的观念演进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更无法为我们当代的媒介演化与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关联提供什么启发性的思考。严谨的历史记录和力戒推测的实证态度,对印刷术方方面面的细致描写,使该书成为了一篇资料性的档案,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关闭了我们关于印刷术的想象力。

然而,《印刷机》全然不是如此。爱森斯坦在史料的数量与质量上并没有能够整体超越《印刷书的诞生》,但却充满着理论的张力。她试图将印刷机理解为一种传播革命,而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技术形式及其市场。这种传播革命中介着思想与社会,创造着新的社会关系,并因而改变着人类的行动与观念。所以她强调从媒介环境学式的角度去重新表述了一个历史问题,这场传播革命而不是印刷术的后果如何影响了人类的观念:

“如果把注意力聚焦于传播变革,将有助于我们把思想和社会联系起来,同时又可以使我们避免把经济和思想的上层建筑联系起来,避免把两者的强行塞进预制的图式里。”(爱森斯坦,1979/2010:428)于是,爱森斯坦



超越了实证主义史学的世界观,将琐碎的因果关系上升到人类历史的整体高度。那些看来不太相干,分散于欧洲各地,内容各不相同的历史事件,如文艺复兴的第二阶段、宗教改革、天文学与医学的兴起、图书市场的繁荣与大学的兴起、地理大发现、各国俚语文学的兴起与拉丁文的衰落、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科学的兴起以及人类知识生态的变革、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标准化思维和观念的出现甚至是专利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因印刷术而走到了一起。这种整体性思维以及对研究问题的重新陈述为后来的研究者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大家透过印刷术,透过人类传播革命去体味人类走向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去感受人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化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这种视角自然地引发当代学者的想象:如今我们已经迈入信息时代,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不同于西欧现代性进程的革命性变化,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革命带来的社会与思想的建构,我们会面临何种机遇与挑战?

爱森斯坦没有达到实证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完善境界,但这不影响《印刷机》为社会科学理论增添各种启发。她的社会观念史研究在方法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问题,但理论意义却反而被激发出来。正如米尔斯所评价的那样:“一流的社会分析家会避免僵化的程序;在著作中他尽力发展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1959/2001:130)在米尔斯那里,有想象力的学者通常有整体意识,历史意识和发现问题重述问题的能力,而《印刷机》毫无疑问地符合上述条件。《印刷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反思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我们是否一定要遵循实证主义史学那些实现不了的因果关系的清规戒律。事实上,如果思想史一定要做成像编年史那样的档案汇编,它的理论意义便丧失殆尽。思想史研究一定是一种历史语境中的理论研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思想史首先是理论书写而不是历史书写,尽管史料必然是其基础。思想史的任务并不是在陈列思想和编辑思想,它的任务更多地是去激活思想,让它们再度发言。

《媒介环境学》一书对爱森斯坦评价甚高:“她知道麦克卢汉对印刷机影响的研究,但她的研究路子更加富有学术价值,不像麦克卢汉那样带有玄想的意味。《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被认为是论印刷术文化影响最重要的著作。”(林文刚,2006/2007:288)然而在笔者看来,爱森斯坦这部作品的优点并不在于她的严谨务实,因为在整本书的因果关系论证中,

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漏洞百出。所以如果真从实证主义史学的角度来看,《印刷机》一书在史学界的地位应当不会太高。然而,她的成功恰恰得益于来自麦克卢汉的玄想。

(责任编辑:高岩)

引用文献 [Reference]

费夫贺,马尔坦 (2006).《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76年).

[Febvre, L. & Martin, H. (2006). *The coming of the book*(tran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6).]

吉姆·麦圭根 (2010).《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2004年).

[McGuigan, J. (2010). *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4).]

林文刚 (2007).《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2006年).

[Lum, Casey Man Kong (2007). *Perspectives on culture*(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6).]

麦克鲁汉 (2008).《古腾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造成》(赖盈满译).台北:猫头鹰出版(原著出版于1962年).

[McLuhan, M. (2008).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trans.). Taipei: Owl Publishing House(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2).]

赖特·米尔斯 (2001).《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原著出版于1959年).

[Mills, C. W. (2001).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tran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9).]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2010).《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79年).

[Eisenstein, E. L. (2010).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9).]

张文杰等(编) (1984).《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Zhang, Wenjie (ed.) (1984). *The translate collection of modern western historical philosophy*.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